

· 学术视野 ·

列宁“灌输论”中关于受众主体性的理论阐释*

卢 刚 朱晨鹏

【摘要】列宁“灌输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重要内容，在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国内外理论界对列宁“灌输论”存在一些误解，其中比较典型的是认为其忽视了受众的主体性。通过研究列宁“灌输论”的原文本意可以发现，它充分重视受众的主体性。这主要表现在重视受众群体的内在理论需求及其内在差异性，重视灌输手段多样性，重视所灌输内容与群众运动的有效结合。正确理解列宁“灌输论”，对于推进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理论宣传工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列宁 灌输理论 受众主体性 思想政治教育

“灌输论”是列宁在20世纪初领导俄国革命运动过程中提出的重要理论，其基本内涵为：工人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无法意识到自身利益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性，只能自发地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没有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①，社会主义意识只能由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从外面灌输给工人阶级。列宁“灌输论”自问世以来，便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原则遵循和方法指导，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与此同时，列宁“灌输论”也饱受争议和批评，其中较为典型的负面评价有“灌输强制论”“灌输压迫论”等。这些评价的措辞表达虽不尽相同，但都把灌输理论看作线性、单向的封闭过程^②，暗指灌输理论蔑视、忽视受众的主体性。如有学者认为，“灌输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强制，或者说是对于行为者的主体性和理智能力的蔑视”^③；有学者站在启发式教学角度，认为灌输论“不允许受教育对象在多种观点的启发下进行批判性的思考”^④；也有学者把灌输理论定义为千篇一律的教学方法，忽视差异性，用始终一贯的教学方法来教育学生^⑤。细究列宁“灌输

*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媒体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研究”（17KDB011）的阶段性成果。

① 《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7页。

② 参见李太平、李炎清：《灌输式教学及其批判》，《高等教育研究》2008年第7期。

③ 陆有铨、戚万学：《关于我国道德教育的几点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④ 孙旭武：《对大学生思政教育思维方式的转变及实现路径——从反思“灌输”理论谈起》，《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⑤ 参见张传萍：《灌输式大学德育的弊端及创新出路》，《武汉交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12期。

论”的原本本意，不难发现以上种种观点都对列宁的本意产生了一定的误解。列宁“灌输论”不仅反对不顾对象、不顾方法的生硬灌输，反而多次强调要重视受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需求，重视通过多样化的灌输途径来调动受众接受理论的积极性。正确理解列宁“灌输论”，对于推进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和理论宣传工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列宁“灌输”本义的词源分析

列宁“灌输论”引发一些学者对其“强迫性”“忽视受众”的误解，与“灌输”一词在中文的字面意思有直接关系。在“灌输”一词中，“灌”字通“灌注”“灌溉”，可引申为注入、装入，“输”字通“运送”“运输”，合起来有“灌注输送”之意^①。因为“灌”字内含自上而下的居高之感，“输”字有由此到彼的单向之意，“灌输”往往被应用在高压、强迫的语境中，即灌输者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不顾及受众的主体性，仅仅凭借自身权威性将相关思想强制“灌注输送”给受众。然而，细究“灌输”一词在列宁论著中的本意不难发现，列宁对“灌输”一词所作的相关阐述并没有强迫性的含义。

首先，列宁“灌输论”的思想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生都在认真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原著，并将其付诸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理论宣传的诸多论述是列宁“灌输论”的重要思想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在相关论述中多次使用“灌输”一词，但并没有体现出“强迫受众”的含义。如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曾批评拉萨尔派“歪曲那些花费了很大力量才灌输给党而现在已在党内扎了根的现实主义观点”^②。这里的“灌输”在德语原文中是“beigebracht”，原意为“教会、传授”，与中文里的“灌输”有很大区别^③。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发展》一文中曾对一幅画所起到的宣传作用给予高度评价，指出其“所起的作用要比一百本小册子大得多”，“当然给不少人灌输了社会的思想”^④。这里的“灌输”对应的德文原文为“empfänglich gemacht”，原意为“使易于接受、使易受影响”，也未体现强迫受众接受思想灌输的涵义^⑤。此外，通过考察可以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其他论著中的“灌输”一词，多为“传授、教育，使其便于接受、利于理解”之意，均无强制传授、忽视受众之意。

其次，列宁“灌输论”受到考茨基的直接影响。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集中阐发了灌输理论，其中着重引用并高度肯定了考茨基对“灌输”一词的相关阐述，即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東西，而不是一种从这种斗争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东西^⑥。在此

① 参见新华大字典编委会编：《新华大字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13、81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6页。

③ 参见曹江川：《列宁思想政治教育的本真含义——从“灌输”一词的翻译谈起》，《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21年第3期。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89—590页。

⑤ 参见曹江川：《列宁思想政治教育的本真含义——从“灌输”一词的翻译谈起》，《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21年第3期。

⑥ 参见《列宁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7页。

基础上,列宁进一步对灌输理论的必要性、践行方法等问题进行了充分论证和阐述。需要注意的是,在列宁转引的考茨基相关论述中,“灌输”一词的德文为“hineintragen”,其原意是“引入”“携带”,而在英译本中该词为“introduce”,即“介绍”“引入”,也没有强制与忽视受众的涵义。

最后,列宁本人对“灌输”一词的使用,也未体现强迫对象、忽视受众之意。在《怎么办?》的“自然高潮的开始”一节中,列宁集中阐发了灌输理论并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①。这句话被认为是列宁灌输理论的核心观点。“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的俄文原文为“Оно могло быть принесено только извне”,中文可直译为“它只能从外面引入进来”。这句话表达出对无产阶级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并没有“灌注输送”的强制性意味。据学者曹江川考证,《怎么办?》最早的中译本是解放社1939年译本,该译本首次将“принесено”一词译为“灌输”,此后的诸种译本虽对其他地方多有改动,但“灌输”一词的中文译法均被保留下来^②。

综上所述,在列宁“灌输论”的形成与发展中,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是其思想源头,考茨基的相关阐述对其产生直接影响,但在其文本中,“灌输”一词的德文均无强迫、忽视受众之意。列宁是在强调对无产阶级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和方法论时使用“灌输”一词,其俄文原文也没有忽视受众、强制灌输之意。

二、列宁“灌输论”对受众的多维重视

列宁“灌输论”的论述并没有将受众贬低为单纯接受思想宣传的被动客体,而是重视受众对灌输内容的内在需求,重视受众内在差异性和灌输手段多样性,重视受众的思想和行为反馈,从而实现科学理论和工人运动的有效结合,引导工人运动从自发走向自觉,真正发挥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一) 重视受众对灌输内容的内在需求

列宁“灌输论”重视群众接受理论宣传的主客观条件。在客观条件层面,列宁指出,随着革命群众阶级意识的觉醒,俄国自发性工人运动走向高涨,这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现实基础;在主观条件层面,列宁注意到无产阶级在革命运动中对理论有内在需求,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其一,列宁重视受众阶级意识的自发觉醒。“革命并不取决于宣传,如果没有革命的条件,任何宣传既不可能加速革命,也不可能推迟革命”^③。俄国自发性工人运动的高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社会条件。19世纪末,俄国社会矛盾和阶级对立逐渐激化,俄国工人阶级日益认清沙皇反动统治的真正面目,他们依靠阶级本能反抗现实压迫,频繁组织罢工、游行等运动。据统计,

^① 《列宁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9页。

^② 参见曹江川:《列宁思想政治教育的本真含义——从“灌输”一词的翻译谈起》,《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21年第3期。

^③ [英]阿瑟·兰塞姆:《伟大的领袖》,选自《回忆列宁》第5卷,侯焕阁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35页。

俄国在19世纪80年代发生了446次罢工和骚动；在19世纪90年代的前5年发生了232次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到15.7万人^①。列宁在仔细观察并确认俄国无产阶级自发意识觉醒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灌输理论。列宁认为，广泛的自发性工人运动“清楚地证明了重新高涨起来的人民运动的深度”^②，加速了俄国革命进程。但在此过程中，工人阶级“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意识”^③，因此必须由外向内灌输社会主义意识，防止工人阶级被其他思潮所影响和利用，从而推动俄国工人运动从盲目的自发运动转向具有阶级意识和鲜明目的的自觉运动。

其二，列宁重视受众内在主动的理论需求。列宁强调对无产阶级进行的理论灌输，绝非罔顾客观事实、忽视受众实际需要的生灌硬输，而是建立在革命群众对先进理论的迫切需求之上，建立在群众行动高涨而政治知识匮乏的事实上。在列宁系统阐述灌输理论之前，俄国革命群众已经开始掀起自发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高潮，各地纷纷成立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马克思主义的书一本又一本出版，马克思主义的杂志和报纸相继创办起来”^④，“青年学生普遍倾心于马克思主义”^⑤。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广泛传播证明了革命群众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普遍需求，也证明了列宁“灌输论”是在受众迫切需要科学理论指导的这一背景下所产生的，绝非罔顾受众需要而强制进行的思想填鸭。此外，列宁精准地把握了群众对科学理论的内在需求。列宁在阐述灌输理论时，多次提及工人阶级接受政治知识的积极性。如在《怎么办？》中，列宁通过引用群众文章，证明工人阶级渴望参与政治生活和获取政治知识，指出他们并不是用“经济主义”政治稀粥就能喂饱的小孩子^⑥。然而，工人阶级实际的理论需求在现实中被大多数人所忽视，“鼓动传单和秘密书刊都感不足……工人小组没有鼓动员”^⑦。由于无法接受系统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人群众往往只能从学生处获得相关理论传授，而这些学生也只是具备零星的政治知识和片断的社会主义观念^⑧。列宁精确地把握了群众学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需要，系统提出“灌输论”。他还指出，在俄国工农群众学习政治理论热情高涨的情况下，若不及时对其宣传灌输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他们将会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影响，因为资产阶级所具备的宣传工具与经验要丰富得多。

（二）重视受众内在差异性和灌输手段多样性

列宁始终强调要注重受众的内在差异性，并在此基础上借助多样化的载体和手段，针对不同受众开展全方位、多角度灌输，充分调动受众的积极性。灌输手段和灌输方式都要为受众服务，力争实现灌输效果的最大化。

① 参见〔苏〕鲍·尼·波诺马辽夫主编：《苏联共产党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6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6页。

③ 《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7页。

④ 《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03页。

⑤ 《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82页。

⑥ 参见《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58页。

⑦ 《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85页。

⑧ 参见《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2页。

其一，列宁注重分析灌输受众的差异性。一些观点认为，列宁“灌输论”忽视灌输对象的内在差异，对受众进行高压的思想填充，而这种千篇一律的灌输方法必然导致教条主义，最终结果是“根本达不到预期效果，起不了任何作用”^①。但是，通过分析原文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列宁不仅高度重视受众的自身差异性，而且多次强调要以此为依据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对受众展开理论灌输。一方面，列宁重视受众的不同身份。在俄国革命期间，列宁便已认识到应牢牢坚持向无产阶级灌输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总方针。但无产阶级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内部由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所构成，对于他们的思想灌输应根据其不同职业身份并联系社会实际具体开展，即“对马车夫讲话应该不同于对水手讲话，对水手讲话应该不同于对排字工人讲话”^②。在苏维埃政权建设时期，列宁同样强调受众身份的具体差异，认为理论灌输应与受众的自身经历及个人特长进行有效结合，“工程师为了接受共产主义而经历的途径将不同于过去的地下宣传员和著作家，他们将通过自己那门科学所达到的成果来接受共产主义，农艺师将循着自己的途径来接受共产主义，林学家也将循着自己的途径来接受共产主义”^③。另一方面，列宁注重受众理论水平的差异性。俄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发展不均衡，不同地区间即使从事相同职业的群众，在文化素质和理论水平上也存在较大差异。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一文中，列宁根据工人阶级的主客观条件差异将其划分为三个部分，即先进工人、中等水平的工人和水平较低的广大群众，并指出向工人阶级传授政治知识、灌输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必须注意其内部成员间的理论水平差异，从而采用不同的宣传手段和方式，使灌输内容更有针对性，最大程度上实现因材施教^④。

其二，列宁重视灌输手段的多样性。列宁在分析把握受众内在差异性的基础上，强调要结合实际采取多样化的灌输方法，调动受众接受思想灌输时的内在积极性。

首先，列宁注重对受众进行启发式教育。列宁“灌输论”本身就含有灌输性与启发性相统一的含义。列宁指出，对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理论灌输，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必须坚持的原则，灌输性的原则和权威必须得到保证。但在此过程中，应充分调动受众在理论学习时的积极主动性，激发受众对于社会政治和自身命运的内在思考，从而“提高工人的阶级自觉，促使他们组织起来，指出斗争的任务和目的”^⑤。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应该设法激发工农群众自我思考，如在文字灌输时应“启发肯动脑筋的读者不断地去思考更深一层的问题”^⑥。

其次，列宁注重灌输内容与受众实际生活的有机结合。列宁始终反对抽象教条的理论宣传，主张理论联系实际，切入群众的现实生活，推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无产阶级群众现实境遇相结合，从而调动受众积极性。在俄国革命期间，列宁就号召革命者深入工农群众，对其所遭受的现实压迫

① 罗红杰、平章起：《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的理性审视及其当代价值》，《湖湘论坛》2019年第5期。

② 《列宁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36页。

③ 《列宁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56页。

④ 参见《列宁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09—238页。

⑤ 《列宁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0页。

⑥ 《列宁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22页。

展开调研，并“利用这种压迫的每一个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只有对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压迫给予全面政治揭露，才能完成“发展工人的政治意识的任务”^①。在苏维埃政权建设期间，列宁同样重视共产主义教育与现实社会生活的结合，强调对工农群众进行理论灌输要从社会主义事业的现实建设入手，如果脱离实际，从小册子和著作中得来的关于共产主义的书本知识将会变得一文不值^②。

最后，列宁注重理论灌输的通俗性。“最马克思主义 = 最通俗和朴实（转化）”^③，列宁在践行灌输理论时，非常注重理论的通俗化表达。在理论宣讲时列宁指出：“我只知道当我‘发表演讲’的时候，我总想着我的听众是工人和农民。我希望为他们所理解。”^④列宁同时强调宣传话语的通俗性，“如果我们不办通俗的机关报，群众就会被其他政党夺去”^⑤。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强调灌输内容的通俗化表达，是为了便于大部分工农群众接受理论灌输的策略需要，而对于已经具备一定阶级觉悟和理论水平的先进分子，列宁则号召对他们进行更深层的理论教育。此外，列宁指出，通俗绝不等于庸俗，坚决反对以通俗的名义来庸俗化马克思主义，反对浅显和片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列宁曾经对庸俗化和通俗化作出明确区分。在列宁看来，两者都会运用一些广为熟知的例子和警句，但不同之处在于，庸俗化仅满足于“通过一种畸形简化的充满玩笑和俏皮话的形式，把某一学说的全部结论‘现成地’奉献给读者”^⑥，而通俗化则更进一步地“启发肯动脑筋的读者不断地去思考更深一层的问题”，并且“帮助这些读者进行这种艰巨的工作，引导他们，帮助他们迈开最初的几步，教他们独立向前走”^⑦。

（三）重视灌输内容与群众运动的有效结合

列宁绝非将工农群众看作纯粹被动接受思想灌输的对象，而是重视其接受理论灌输后的思想反馈和行动反馈。理论灌输只是手段而非目的，真正的目的是激发起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发挥其在革命和建设进程中的能动作用。

其一，列宁注重受众接受理论灌输后的思想反馈。在列宁看来，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灌输给工农群众，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工农群众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后，会根据自身的现实经历与阶级本能意识进行思考，从而对所接受理论作出反馈，进而实现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补充、完善与发展。列宁曾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⑧列宁在此论述的是，在没有外部力量进行指引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单纯依靠自身的自发性，注定无法生成社会主义意识。但倘若对工人阶级进行思想引导和理论灌输，激发唤醒其阶级

① 《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43页。

② 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83页。

③ 《列宁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22页。

④ [英]阿瑟·兰塞姆：《伟大的领袖》，选自《回忆列宁》第5卷，侯焕阁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页。

⑤ 《列宁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95页。

⑥ 《列宁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22—323页。

⑦ 《列宁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22页。

⑧ 《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7页。

自觉与阶级意识，则在工农群众中完全有可能涌现出一批先进分子，他们将结合自身经历实现对灌输理论的再补充，并以理论家的身份进行理论拓展和创新，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当然不是说工人不参加创立意识形态的工作。但他们不是以工人的身份来参加，而是以社会理论家的身份”^①。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党应加大对工人阶级的灌输教育力度，提升全体工人的觉悟水平，从而培养更多的工人理论家。此外，列宁注重思想灌输进程中工农群众的理论参与。如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列宁便鼓励无产阶级参与到写作事业当中来，指出文字写作不应当是少数个人的赚钱工具和把戏，而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参与的事业，“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齿轮和螺丝钉’”^②。列宁还强调，布尔什维克党要多组织这种与工人运动相联系的写作事业，激发工农群众的写作热情，从而调动起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参与理论宣传的积极性。

其二，列宁注重受众接受理论灌输后的行动反馈。列宁强调对工农群众进行理论灌输，最终目的是为了调动无产阶级的革命积极性，引导工农群众在革命进程中由自发走向自觉，从而实现先进理论与现实运动的有机结合。因此，列宁在灌输过程中极其重视工农群众接受理论灌输后的行动反馈。

首先，列宁注重发挥工农群众对理论灌输的推动作用。在俄国革命时期，由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革命力量相对有限，因此必须首先集中精力在城市工人群众间进行组织建设和理论灌输。但列宁同时指出，此举并非忽略和放弃广大手工业工人和农民，而是要注重发挥城市工人的革命引导作用。在对城市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组织培训后，“使这些工人同无产阶级中比较落后的阶层接近时，把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的思想……也带给这些阶层”^③。城市工人的这一贡献被视为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在苏维埃政权建设时期，针对俄国农村群众共产主义意识相对淡薄的情况，列宁指出，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来完成农村地区的共产主义教育是不够的，必须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并着重强调要发挥城市工人的能动作用，即“利用我们的政权使城市工人真正成为在农村无产阶级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人”^④。

其次，列宁重视理论灌输对工农群众实践运动的指导作用。对工农群众进行理论灌输，最终目的是发挥无产阶级主体精神，引导广大工农群众投身革命和建设事业，这一思想贯穿列宁“灌输论”的始终。在俄国革命时期，列宁便已指出，对工农群众进行理论灌输决不能只停留在思想层面，更应该调动人民群众的实践品质与能动精神，最终将理论灌输落实到无产阶级投身革命的现实行动当中。在此过程中，列宁提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启发工农群众的阶级自觉，“教育他们进行一致活动并为社会民主主义理想而斗争”^⑤，并给出了一些具体措施建议。在苏维埃政权建设时期，列宁同样重视理论灌输对现实生活的指导作用，他指

① 《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26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3页。

③ 《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2页。

④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65页。

⑤ 《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4页。

出，“整个共产主义宣传归根到底要落实到实际指导国家建设。应该使工人群众把共产主义理解为自己的事业”^①。

最后，列宁注重从受众中选拔培养职业革命家。早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一文中，列宁便依据理论水平和觉悟程度的差异将工农群众划分为三个部分，并指出通过对先进工人这一群体进行灌输培养，完全有可能锻造出工人运动新的领导者和优秀的理论家。马克思主义政党应致力于提升整个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从先进工人中选拔更多的杰出人才，同时还应注重提升其他中等工人和普通群众的水平。在《怎么办？》等著作中，列宁已注意到工农群众中存在宝贵的人才力量，问题是“我们不善于利用所有这些人”^②。此外，列宁还多次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便是从工农群众中“选拔出一些俄国的倍倍尔”^③，培养更多的能够胜任革命工作的职业革命家。

三、列宁“灌输论”重视受众主体性的时代启示

列宁“灌输论”重视受众的内在主体性，蕴含着丰富的群众性思想。但由于翻译、西方语境误导等原因，一部分人对列宁这一思想产生了“强迫受众”等偏见误解，忽视了其中的丰富内涵。列宁不但没有将灌输过程看作单向的思想填鸭，反而高度重视受众内在的理论需求、个体差异以及能动的实践品质，注重理论灌输与群众运动的良好互动。列宁“灌输论”中关于受众主体性的理论阐释，对于新时代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和理论宣传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克服偏见，准确理解“灌输”的丰富内涵

近年来，列宁“灌输论”之所以饱受质疑与批评，除去“灌输”一词中文意译带给人强制教条的直观印象外，也与西方学界多从负面意义上使用“灌输”一词有莫大关系。美国著名教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认为，“外部的灌输，不仅不能促进反而限制了儿童的智慧和道德的发展”^④。美国学者迈克尔·梅里（Michael S. Merry）也曾强调，“灌输一般包括那些回避理性审视、施加心理压力的策略手段……它往往借助强制手段”^⑤。其实，在英语文本中，同样是表达使之接受某种思想或情感的词汇，也有“indoctrinate”等偏贬义和“inculcate”等偏褒义的词汇，类似中文语境中“强行灌输”和“谆谆教诲”之间的差别。国内在译介西方此类文献时，往往将西方文献中的“indoctrinate”与中文里的“灌输”等量齐观，以致加深了对“灌

①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09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7页。

③ 《列宁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62页。

④ 赵祥麟、王承绪编译：《杜威教育论著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349页。

⑤ 转引自孙来斌、高岳峰：《“灌输”的双重视界——马克思主义“灌输论”与当代西方灌输批判理论的话语差异》，《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5期。

输”一词的误解。列宁多次表达出对理论作纯粹教条式宣讲的反感，认为这样只会培养出共产主义的书呆子、吹牛家。在列宁看来，对工农群众进行理论灌输要注重调动受众的内在兴趣，帮助他们理解现实政治问题并激发其参与政治的热情。在列宁关于灌输理论的论著中，有许多现代教育方法蕴含于其中，如借助群众熟悉的事实来达到宣传目的的案例教学法，发挥先进人物示范与号召作用的榜样示范法，以及调动工农群众政治思考热情的启发式教学法，等等。因此，我们研究列宁灌输理论的当代价值，要注重从原文著作中去领会列宁的语境表述，把握文字表述背后的精神内涵，汲取文章原意中的宝贵精华，避免被西方语境与其他偏见所影响，在求真务实中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义。

（二）尊重受众，充分重视受众的主体差异性

列宁强调，理论灌输必须“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①，并要充分调研理论受众的主体差异性。在灌输载体的选择上，列宁指出要根据不同受众类型而有所区别，如针对先进工人与中等工人，要通过机关报纸来满足其理论需求；而相对于普通群众，灌输载体则主要侧重于通俗册子和揭露传单。在灌输方法上，列宁也注重通过启发工人思考、联系群众实际等多样方式调动受众兴趣。

在当代社会，宣传教育环境与灌输载体工具已发生多样变化和深刻变革，但列宁“灌输论”注重载体和方法的多样性，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思想政治教育和理论宣传工作中，要增强“分众化传播”的意识，充分重视接受主体在职业身份、文化素养、理论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的载体创新、方法创新和内容创新。一方面，要依据受众类型选择多样化的灌输载体。在当代，理论灌输工作面临的对象群体极为庞大，受众职业身份与理论水平差异巨大，既有具备一定理论素养的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也有政治意识相对淡薄的普通群众。面对群体庞杂、类型多样的灌输受众，理论宣传工作者绝不可以“一视同仁”，应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调研访谈等方式分析掌握灌输对象的类型差异，把握不同地区、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群体所偏好的信息交流途径与承载方式，从而注重发挥网络、讲坛、书刊、影视、社团等多元载体的不同功能来推动理论灌输，实现线上线下灌输渠道的双轨并举，完成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的跨度飞跃。另一方面，要根据受众差异恰当运用灌输方法。在依托传统手段进行政治理论教育时，我们要根据具体情况和具体环境恰当选择灌输方法；在确保灌输内容正确、权威的基础上，围绕受众的信息敏感点创新传播方式和方法，设法调动受众自身的内在兴趣，实现政治理论教育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能效转变。

（三）辩证互动，延伸理论灌输的传播链条

列宁在强调灌输权威性的基础上，充分尊重受众的内在能动性，实现理论灌输双向互动的良性循环。新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理论宣传工作，既要坚持灌输者的权威地位，发挥宣传阵地举旗定向的领导作用，又要尊重灌输对象的自我意识和内在特性，准确把握理论宣传工作中的主客

^① 《列宁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6页。

体辩证统一关系。

首先，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中，应坚决贯彻执行党管媒体、党管宣传、党管教育的工作方针。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① 在确保灌输权威性的基础上，也应加强理论宣传队伍建设，提升宣传教育人员的自身素质，因为“灌输主体的思想魅力、人格魅力等综合素质也会影响到客体对灌输内容的态度和接受程度”^②。

其次，理论灌输工作应充分重视受众的反馈。在网络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格局和舆论生态发生深刻变化，信息传播方式由过去的自上而下单向度宣传，变为立体多元的全方位互动，因此要注重把握灌输主客体的辩证关系。灌输过程中的主客体身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受众并非一直处于被动地位，他们接受理论灌输后产生的思想反馈可以对灌输内容起到良好的补充作用。另外，平台媒体在近年来的异军突起，也与重视用户内容生产和用户互动有着密切关系。网络空间的理论宣传工作，要注意利用人工智能与数据分析技术，观察统计视频、文章的点击数量与互动反馈，分析弹幕、评论留言等互动内容，从而把握网民受众群体在接受理论灌输时的情绪偏好与意见评价，并以此为参考调整后续的灌输内容推送。在线下从事理论灌输也要注重现场群众的意见回馈。在党校、高校等教育场所进行相关政治培训时，可通过师生互动、课后调研等方式及时把握学员的意见想法，并对意见评价辩证吸收，切忌把思想政治教育和理论宣传变成一场踽踽独行、孤芳自赏的独角戏。

最后，新时代的理论灌输工作也要走好群众路线。列宁在践行“灌输论”时注重发挥工人阶级对农民与手工业者的宣传教育作用，这是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革命运动中坚持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新时代的理论灌输工作，仅仅依靠主流的宣传教育力量是不够的。我们应继续运用好群众路线这一重大法宝，在灌输过程中从受众里选拔培养一批思想红、素质硬的高质量人才队伍，加强官方主渠道与民间自媒体的沟通合作，打造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多维矩阵，不断延伸理论灌输的传播链条，实现理论灌输工作在群众中的整体推进和接续发展。

[卢刚系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朱晨鹏系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3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柳 达]

①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工作》，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1页。

② 朱红：《灌输论在新时代青年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定位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9年第3期。